



# 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日军轰炸的意识演变

——以1938-1943年《国民公报》等报刊为主体的考察

鲁克亮,刘琼芳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要:**1938年2月日机开始对重庆实施轰炸之初,虽然引起了重庆民众的惶恐不安,但由于盲目迷信观念和侥幸心理作祟,在对待政府所倡导消极防空最善之法——疏散人口上,市民遵从政府的劝导者不多,而徘徊观望者众。经过1939年5月至1941年9月间的狂轰滥炸后,民众的反应仍然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为镇静有序、遵命而行;一为听天由命、罔顾政令。至1941年10月后,随着日机对重庆轰炸次数的逐渐减少,重庆民众对于轰炸之惨状,似乎也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重新回到关心自己当下的、琐碎的、现实利益的生活轨道,对防空等战时公共事务不再多加关注。

**关键词:**重庆民众;大轰炸;意识;抗战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1-0180-06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成为中国抗战之中枢。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从根本上打垮中国,日本空军自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地区进行了长达5年半之久的轰炸。轰炸持续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的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sup>[1][192]</sup>。对于重庆大轰炸的起因、特点和过程,以及重庆人民反轰炸斗争的特点、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学界已作过一定的研究,相关论著颇多。本文则拟利用当时各种媒体的记述,展示置身事变之中的民众当时对重庆大轰炸的认识及其演变过程。历史学家关于重庆大轰炸对重庆社会生活的影响作了诸多论断,这对认识历史固然重要,但当时亲历者的反映与认识对探知历史面貌显然更为重要。

## 一、1938年2月以前重庆民众的态度

自抗战伊始,有识之士就指出,“自从有了空军以后”,现代“战争已由平面变成立体”,决无前线后方之分,日本飞机随时会“飞到后方重要地点,肆行轰炸,摧残我们的政治中心地”<sup>[2]第1版</sup>,并且“敌机所至,城市为墟,若不严加防卫,将必失去保障”<sup>[3]第3版</sup>。重庆虽为“长江上游重镇,敌人远在数千里”之外,但因国府所在,随时有日机空

袭之可能,“对于防空事宜,更应积极准备”<sup>[4]第3版</sup>,未雨绸缪。政府亦一开始就把重庆的防空问题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宣传到防空设施的筹办等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直至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空袭重庆,一般重庆民众皆“以为建设防空,全是政府或军警的事”,于自己“是漠不相关”<sup>[5]第8版</sup>的事情。这种行为和态度上的反差表面很难理解,实则不足为怪。

防空自然属于一种关系民众切身利益之事,但当日军轰炸开始之前,这种切身利益尚不具有直观感。对一般民众而言,最系心怀的是日常生活中与现实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预筹防空不属当下直接关系民众切身的事务,而呈现为“政府的事”,民众很难有急切的关怀之意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凡属于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sup>[6]48</sup>这一规律决定了“华北风云紧急”之际,尽管重庆市政府对于“防空准备”,已是“不遗余力”<sup>[7]第7版</sup>地积极筹备。但防空建设之重要意义却不可能立即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共识,要动员民众积极配合政府之行动,无疑需要一个过程。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后,日本空军就“随时有轰炸”的“可能”<sup>[8]第7版</sup>,防空问题实已迫在眉睫。但从当

\* 收稿日期:2008-05-13

作者简介:鲁克亮(1976-),男,河南舞钢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时报刊的反映来看,重庆防空的准备、建设和宣传,似乎只是政府一厢情愿地在唱独角戏,民众基本无配合行动表示。早在“京沪抗战展开之后”,重庆市政府便“以极短之时间”,进行繁重之防空组织建设,“第一步即将原有之‘防空办事处’与‘防空演习筹备处’改组合并,第二步即集中人才筹划经费,第三步正式成立司令部,第四步开始各种防空设施”<sup>[9]第3版</sup>;且深知由于“防空举办未久,人民对于防空知识尚属浅薄”,“关于宣传事项,最为重要”。防空司令部为普遍宣传防空知识与防空的重要性,组织了“宣传队十大队”,每周“轮流在市区宣传,用以普及”<sup>[10]第3版</sup>防空知识与意识。为了考验重庆防空准备之优劣和民众防空之能力,防空司令部还于1937年10月23日举行重庆第一次全市防空演习<sup>[11]第3版</sup>。1937年底,随着上海、南京等城市的相继沦陷,重庆处于日机空袭的严重威胁之下,为预防空袭,各大机关“均纷纷准备新凿防空壕或避难室”<sup>[12]第3版</sup>。当1938年1月24日日机首次轰炸宜昌后,重庆市政府“鉴于本市人口密度过稠”,日机随时有来袭之虞,为“预防空袭损害”,亟谋疏散渝市人口<sup>[13]第3版</sup>。同时,为加强民众防空经验和增强防空意识,重庆市政府又于1938年2月16日举行了第二次全市防空演习。

与政府积极进行防空建设诸事不相称的是,在此期间,重庆市民的态度和反应却颇为淡漠。《防空季刊》创刊号1938年5月1日载文指出,当时,民众“通常都以为”防空“不是一个严重急迫的问题”,并且此种观念“流行”、“普遍”,“一般人对防空事业”都“不甚热心”<sup>[14]15</sup>,对“防空之意义,及其真正危险所在”,更“不明瞭”,态度十分“冷淡”。虽然“言之者声嘶力竭”,但“听之者漠然无动于心”,甚至有人认为“防空乃政府故张其词”。由于上述认识的存在,因而“纵使政府三令五申”,民众“亦置若罔闻”<sup>[15]第3版</sup>,“率多袖手旁观,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sup>[16]1</sup>。在政府组织防空宣传时,民众最初“绝不曾会知道现在局势与每个人的使命”,只是“为着宣传者坦白的心情,激昂的情绪,悲壮的音调”,才一时使他们的“愤恨由脸上露出,泪水从眼中流下,拼命的拳头也伸了出来”,表示要“去与敌人抗战”。但“当宣传者离开这地方而到另一地方宣传时,这地方的人们渐渐的又将他们愤恨的心情消沉下去,他们会想到为了要饱肚皮,需要实地工作,没有时间再来想到宣传者曾向他们所说的一切”<sup>[17]第4版</sup>。对防空之演习,市民更“大半都以‘儿戏’的态度对付”<sup>[18]第4版</sup>。

但是,在“获闻南京失陷消息后”,市民一旦开如意识到轰炸可能成为现实威胁,便纷纷自动“疏散下乡”。当时的舆论曾分析说,一般民众认为“日寇既占南京,与重庆相距途程,较在上海时为近,飞机必会前来轰炸,所以要赶快躲避”<sup>[19]第3版</sup>。特别是宜昌被轰炸后,对重庆轰炸

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市民的反应也就更加强烈,出现了老弱妇孺“连日迁往乡间者甚众”<sup>[20]第3版</sup>的惊恐行动。但这并不是响应政府之号召,进行有组织之疏散,而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趋利避害式的行动。

从当时的记载看,即便是防止敌机轰炸这样关系一般民众利害的事务,当其未呈现为现实威胁时,即是说民众未感觉到威胁已临到面前时,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预防行动;只有当轰炸的威胁明显地进入民众的意识之际,人们才会紧迫地行动起来。要使民众有有远见有秩序地建构起当时必须建构的防空体系,政府显然必须作出远大于当时已有的努力,否则便不会产生研究者和当时政府想象的实际效果。这不能归咎于民众的落后,而是一种规律使然。

## 二、日机轰炸之初重庆民众的反应

战事的发展很快地使重庆防空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出来。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对重庆市郊广阳坝的轰炸,久居安谧环境而无充分思想准备的重庆市民立即“大起恐慌”。就是“前此一般不大留意防空之众”,也惊慌起来,“咸欲离开已非乐土之市区”<sup>[21]第3版</sup>。《国民公报》两日后的记述说:轰炸开始后,一时“人声鼎沸,奔走若能,全市关门闭户,断绝交通,扶老携幼,提箱抱被,直向城外疏散,所有准备之防空壕一般避难人员早已住满,其紧张已达极点”<sup>[22]第3版</sup>。《新民报》则有如下观感:自此以后,重庆便“多罩了一层空袭恐慌的大雾,每当空袭警报发生后,混乱警骇的程度,真是出乎意外”<sup>[23]第3版</sup>。《万州日报》更记载说,甚至“寇机都未见来”,而“人民心胆早碎,市场更因而冷淡,各业商家几无交易之可言”<sup>[24]第3版</sup>。8月26日,即首次轰炸后的第六天描述的恐慌程度更为严重,其报道说:“缺少常识的一般民众,竟不顾父,妻不顾夫的纷纷逃跑乡村去了”<sup>[25]第3版</sup>。即便是略具常识之知识阶级,也尚不镇静,如内江县“女高之曾某教师,更为谈虎失色”,一闻防空警报后,“于上课时,竟将白墨丢了便跑,学生见教师他去,亦纷纷向外逃去,殊人多拥挤,以致压伤小学生二十余人,手肘撞断二,重伤一人,闻有生命危险”<sup>[26]第4版</sup>。上述报道不无过当之嫌,但至少可以表明在真正的空袭来临之时,重庆民众的恐慌程度显然大有过度之处。

由于防空知识的缺乏,日机的轰炸不仅造成了一时的惊惶失措,还引出了一些“病态”想法和行为:(一)求助神灵。重庆民众对于配有引擎的怪物从天上丢下死亡这样的事情感到无法适应,相当多信佛受佛教影响者便把祈祷神灵保佑视为是最有效的方法。《国民公报》载《镇静》一文指出,在受了空袭之后,恐慌的市民更“不分皂白地笃诚崇拜和跪祭菩萨了,好像菩萨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唯有求得他的欢心,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保障,才能

安心地讨生活”<sup>[27]第7版</sup>。《万州日报》有一更典型事实的记载,其言朝天码头上“有口石钟”,市民“请着和尚,一天香烟缭绕,青灯红磬地供奉着,原因是重庆市区之不遭空袭,就是这口钟的庇护”<sup>[28]4</sup>。(二)盲目扰动。一些对防空常识茫无所知,甚至“不知炸弹机关枪之厉害”的市民盲目胆大,竟“闻警报声若无其事,当紧急警报禁其通过时,多不以为然,故意往来”<sup>[29]第2版</sup>。而另外“一般胆小市民,夕不安枕,初则胡思乱想,疑神疑鬼,继而道听途说,辗转相警,于是满城风雨,一若大难将临”,更有“敏感神经质者,东方未明,即离床梳洗,催娘姨急作早点,挈妇携雏,……急走储奇门,曙色中争渡者满坑满谷喧嚷不已,……时至午后三点,始各还家”<sup>[30]第3版</sup>。(三)首次空袭后的离奇意识。2月18日轰炸后,因一段时间未见敌机来侵,市民们便“放下了心,有许多胆壮的,也陆续的回到城市里来了”。但他们并不明了这只是敌机轰炸的间隙,而是相信有某种神鬼保佑。《万州日报》指出,“因几次的警报都没成事实,而最巧的是在警报未发以前,天气是非常晴朗,而在警报发后,全市顿时灰暗下来,罩上了一层云雾,这样一来,飞机是不能来了”<sup>[31]第8版</sup>。市民因此认为定有神灵保佑,从此“敌人大约不会来轰炸市区”。该报还进而指出这不是少数人的想法,“许多人都都这样想着”<sup>[32]第4版</sup>。

以上舆论所展示出的重庆民众情绪倾向,表明普通民众面对空袭时尚不可能自发产生有秩序的防空行动,由政府组织防空是最为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当时,重庆积极防空的能力有限,难以有效阻止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同时鉴于“一个大城市的防空设备,不管如何完善,总不能做到保险的地步”<sup>[33]第1版</sup>,于是,重庆防空当局便比较重视消极防空工作,而消极防空最重者,尤“以疏散人口避难与周旋,应战持久待时阶段所必不可少的有效方法”<sup>[34]18</sup>。自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郊,10月4日首次空袭重庆市区,尤其是1939年1月15日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重庆市区,重庆市防空当局推行了一系列关于疏散人口的办法。如1938年6月实施疏散妇孺于四乡的计划<sup>[35]第6版</sup>;是年10月的疏散渝市人口办法<sup>[36]第3版</sup>;1939年2月成立人口疏散委员会<sup>[37]第3版</sup>;发布《告民众书》<sup>[38]第3版</sup>,组织疏散人口宣传周活动等<sup>[39]第3版</sup>。同时,为消除市民观望情绪,市政府还特派专人会同地方保甲,挨户劝告,饬其迅速迁移<sup>[40]第3版</sup>。并规定自2月底起至3月10日为自动疏散时期,11日以后至4月10日,则强制疏散。<sup>[41]第3版</sup>

经过政府一系列强有力的消极防空工作,市民终于开始响应政府倡议,遵照疏散人口办法,按照所制定之疏散路线,“纷纷自动疏散”。报载“迁徙下乡”最盛时,“连日不下数万人”<sup>[42]第3版</sup>。尽管如此,仍有不少民众由于对轰炸的危险认识不足而违背政府疏散政令。《国民公报》

载《疏散人口》一文对此作了如下分析:因过去川中最多巷战,“川人所想象的战争不特是平面的而且是肉搏的,飞机掷弹的惨状,看过电影的人或许有些畏惧。自从全面战争展开以来,……敌人的兽行野蛮状况,稍稍使蛰伏川内的人们感觉到一些恐怖,准备往内地疏散的人固然很多,满不在乎以为至多不过如往日两军争防地那样的热闹者颇不乏人”<sup>[43]第4版</sup>。另一些民众则出于对都市繁荣生活的迷恋,对政府“三令五申”疏散人口无动于衷,恋恋“不忍遽然离开”<sup>[44]第4版</sup>。还有少数民众以为“个人不守防空法令,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关系,即使遭了危险,那也是自作自受,与人无关”<sup>[45]第3版</sup>。由于上述想法和行为的存在,从总体上计算,当时“遵命迁移者尚不及半数,其余仍住市区之内”<sup>[46]第3版</sup>。

一如前文所述,多数民众对大轰炸开始后的行动皆取决于现实切身利益是否直接受到威胁。当轰炸成为现实威胁时,他们遵从政府的号召进行疏散,而一旦轰炸暂停,他们又会失去继续作好防空预防准备的心理,不少人把轰炸停止,或大轰炸中未受损害归于神灵保佑,甚至以祈求神灵保佑来敌机不再轰炸,也相信神灵的保佑必然生效。这种意识的普遍存在,给政府组织疏散人口等防空工作提出了更为严重的任务。当时重庆市政府在防空组织上有一定效果,但与实际要求的差距尚颇为巨大,正如有评论曾言:“一年来,我们常听见疏散、疏散,但我们的疏散工作,却做得非常不够,……政府缺少通盘筹划,以致整个军事、政府、生产的总动员未能成竹在胸,指挥若定,一切都不免‘吃一节,剥一节’。”<sup>[47]第1版</sup>疏散的问题,“不在乎提办法拟计划,而在乎彻底的执行。过去的计划办法本也不少,可就是多半未实行”<sup>[48]第2版</sup>。这就决定了当时尚不可能将敌机轰炸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

### 三、1939年5月到1941年9月间重庆民众对日机轰炸的心理变化

民众对疏散人口的观望与政府对消极防空措施的执行不力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很快在日机的空袭中得到了显现。据《重庆市防空志》统计,1939年人员伤亡9416人,其中死亡4437人,重伤4979人,损毁房屋4827栋4012间;1940年人员伤亡9643人,其中死亡4323人,重伤5411人,损毁房屋6955栋22197间;1941年人员伤亡4896人,其中死亡2455人,重伤2411人,损毁房屋5668栋10876间<sup>[49]103、106</sup>。仅1939年5月3日一天,重庆市区被日机轰炸的“区域就达一里半之长,广达五百码,……死伤之数,达三千人之多”<sup>[50]第3版</sup>。5月4日伤亡更甚,“达四五千”人,财产损失无可计数<sup>[51]第1版</sup>。1940年8月19、20两天,自19日1时35分至20日14时,重庆市连续遭到4次轰炸,市内“多处起火,较场口大梁子及磁器口街灾情甚重”<sup>[52]第2版</sup>,城内“五分之四地方已成

为一片瓦砾”，重庆“下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所谓城之上段”亦已“全毁于火”。一日之内死伤之数就“有百余人”，而两天“死伤总数，大约在千人以上”<sup>[53]第4版</sup>。

如此大规模的恐怖轰炸与血腥事实，在重庆民众精神与心理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镇静有序、积极补救。《群众》的评论说：在“血与火的磨练中，重庆的市民渐渐镇静起来，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都努力参加起紧急救济的工作”<sup>[54]64</sup>。有许多民众，即使“平时是不关心国事的，经过敌机狂炸的教训后”，都“自发的要求做救亡工作”<sup>[55]80</sup>。同时，轰炸的教训，也使民众认识到惟有积极疏散才是最好的防御方法，在政府组织之下，终使“大量民众，踊跃疏散”。据《申报》的描述，此时“运载难民之车辆，络绎不绝，夜以继昼，截止昨日（1939年5月9日），移出之难民，约达二十万人以上”<sup>[56]第4版</sup>。即便是“往日应疏散而未疏散之人民，已自动纷纷下乡”<sup>[57]3</sup>，并“各据所有，镇定逾恒，毫无悲惨的气象”<sup>[58]第2版</sup>。经过这次疏散，重庆市人口“已较过去（七十万人）减少甚多，据警局调查，全市人口只剩三十余万”<sup>[59]3</sup>。而居留市区之民众，亦表现出镇定有秩的样态，不再惊惶失措。《国民公报》所载戴溯洄《火》一文对当时的情形作了如下描述：“在那残毁的市容上……小商人标起‘愈炸愈坚，照常营业’的标志。余烬里的焦木还在燃烧，可是不远段落上，工人又把旧梁盖新屋，旧砖叠新墙”<sup>[60]第4版</sup>。只要“稍微有一点办法的，都从火坑里自己挣扎起来，去找自己的出路。他们愿意减少政府的负担，好多余一点力量去支持前方的抗战，你看两路口一带，那些缺窗，少门，屋顶已？，墙壁已倒的房子里，不是家家户户仍然照旧在工作着吗？”<sup>[61]3</sup>（二）无可奈何，听天由命。当时在重庆的格兰姆·贝克对这部分民众的反映作了如下分析：在残酷的敌机疯狂屠杀的氛围下，一切的安全、幸福，都不过是渺茫的幻想，在对日本的空袭毫无抵抗的时期，一些民众学会并接受了一种最令人憎恨的前提：谁的生命财产也没保障。他们知道，威胁来自别人，自己无法制止。他们学会了逃避，或者不幸无处可逃了，那就在忍受中用某种哲学来做精神安慰。他们对一切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如果那不是切身利益所关的话<sup>[62]5</sup>。国内舆论亦有类似的分析：部分民众“遇有空袭，不过心理上紧张一时，警报解除，则又苟安如故”<sup>[63]3</sup>。对于疏散，政府虽言者谆谆，而民众听者藐藐，“尽管当局如何的宣传劝告，如何的苦筹计划”，但是，部分市民还是“沉湎于都市生活，甘在此冒绝大的危险”<sup>[64]第2版</sup>。几年来“血与火的教训，在他们似乎没有十分的重视，时常在敌机临头了还要冒险去偷数有多少架，或者看他朝那里投弹之类”<sup>[65]3</sup>。还有民众“今日强迫疏散下乡，明日又偷偷地回返市区”<sup>[66]第3版</sup>。

上述反应表明，1939年5月份日机大轰炸的实施，使民众似乎突然意识到疏散下乡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之

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报刊也发出了“在城市居住，惟有疏散足保安全”的声音，市民自动疏散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在未出现于自己面前的危险与实际利益之间，民众中仍有不少人的心灵天秤是倾向后者的。正如当时报刊的分析所说，因“生活寄托于城市，疏散则生活无所寄托”<sup>[67]第2版</sup>，直接影响自身的切身利益，所以往往“非等到邻家被炸，自己是不搬家的”<sup>[68]第2版</sup>。因此，要把防空做到尽善尽美，政府的工作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客观地说，作为承担主要防空职责的重庆市政府，对疏散人口下乡确已颇为着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二十八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五个半人，二十九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一人”，三十年度更是减少到“约三个半炸弹死伤一个人”<sup>[69]第1版</sup>。数据表明政府的成就是可观的，但同时继续努力的空间也是巨大的。就连时任重庆防空司令贺国光也坦承：“陪都的防空事业，虽已粗具规模，但尚未达到我们理想目的，……疏散人口，在消极方面是最有效的手段，陪都过去虽曾有三令五申，疏散人口，但与既定计划，相差甚远。”<sup>[70]3</sup>《新蜀报》的社论也指出：“我政府在过去数年，曾依劝导，督促及强迫三步骤，来分期进行此政策，虽收获相当效果，但未能达到很完善之目的，则为不可否认之事实。……过去人民进行疏散，多基于恐怖之心理，不是出于有计划的觉悟。人民之组织松懈，人民之训练缺乏，人民未能与战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加之下级执行者，自身之修养欠缺，因此一个很好之命令，通过到底层，往往不是打了七折八扣，就是反而生出相消的结果，故良好命令之不能合理遵行，实非偶然。……只有政府积极的领导，一切工作的进行才可以很顺利。”<sup>[71]2</sup>

#### 四、1941年10月后重庆民众对日机轰炸的轻忽

自1941年9月后，因日美关系日益紧张，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大批南调，全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基本结束了对重庆的大规模空袭，只剩下一些零星轰炸。于是，在“很少受到敌机的袭击”境况下，重庆民众“遂忘了空袭的危险”<sup>[72]3</sup>，更迅速“遗忘了这件疏散的重要工作”<sup>[73]16</sup>。此种意识的存在，直接影响着民众和政府在对防空问题、尤其是疏散人口问题上的作为。

据报刊记载，政府此时虽仍大力宣传劝导疏散，而“疏散的市民，却是寥寥”。报道把民众的认识表述得十分生动，有报道说：“细察近来街谈巷议，茶馆商店，时常有人说：政府又在‘闹’疏散了，真是无病呻吟，……偏要找些无谓的麻烦，明知疏散是不能的事，却天天都在疏散。更有人说：大家都没有疏散，我何必着急呢！”<sup>[74]14</sup>“已经疏散到近郊去的机关和市民以及大批的公务员家属”，见着久无空袭发生，又“相率迁回来了，机关团体是为了免除交往困难和工作效率的斧正，市民和公务员家

属,是为了百货供应不到乡间日用水用煤用电买布购物,都增加了开支。于是人口从四郊向市区核心集中”,重庆很快又再度繁荣起来<sup>[75]</sup>第4版。

有别于普通民众的容易健忘,作为指导者与组织者的政府当局,似乎对于防空事业的推进,尤其是疏散问题仍颇为注重。《国民公报》的社论指出:“敌人在各方面虽已受牵制,而我方又大为加强,空袭重庆,当然不是随便的事。不过,我们对于敌人决不存轻忽心理,所以应该尽量准备,尽量疏散”<sup>[76]</sup>第2版。这虽是报纸的言论,但表达的显然是政府的意志。这一点,从政府部门的行动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为加强民众了解疏散之意义,陪都疏散督导委员会再次组织疏散宣传周,备“大批‘为疏散告市民书’、‘幻灯片’、‘疏散标语’、‘壁报’等宣传品,大量分发”,同时,“派出疏散劝导队,挨户劝导宣传,以期市民及早疏散”<sup>[77]</sup>第3版。

政府的宣传虽仍未减弱,但实行措施则亦有所放松,甚至可说已大打折扣。在疏散之人口管制方面,已呈现出下述状况:“码头车站之检查不严,出入相当便利,疏散之执行未尽彻底,应留应去,多属自由”<sup>[78]</sup>。另外《新蜀报》的社论还提到:“政府行政效率太慢,行政效能太差,于防空言之,也如是,……拿为疏散而清查户口言之,效能实在太差,常见执行此项职务的人沿家查询,随便问问便算了事,有证者无事,无证者也能应付过去,结果有证的人也许被列入疏散之流,而无证的人反而逍遥市内,……防毒问题,久已甚嚣尘上,政府并曾一再晓谕市民,但究竟怎样防法,拿什么来防,则止于说说而已”<sup>[71]</sup>。

普通民众个体对大轰炸及其造成损失的轻忽不难理解。前文已反复论及,一般民众所关注的是现实的生命财产利益问题。只有当日机轰炸成为现实生命财产的直接威胁时,民众才会在“疏散”等防空措施上采取行动,甚至因过度惊惶而做出不可理喻的事情。而当轰炸尚未临到头上,或轰炸由强减弱之际,就会淡忘狂轰滥炸的惨景,重新回到主要关注日常切身利益的状态之中。政府是公共事务的承担者,在应对大轰炸的问题上起到过主导作用,但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对战时重庆防空事务尚未做得更加完美,在轰炸高潮之际,对人口疏散等防空措施的推行力度尚嫌不足,尤其是对部分留恋城市生活无知民众未采取紧急措施,容忍半数市民未行疏散,造成了重大伤亡。当集中轰炸之期过后,重庆市政府尽管在宣传上未稍松懈,但在防空计划实施上却大不如前。在战争尚未宣告结束之前,不管情况发生了何种变化,但敌机是否有可能再度突然空袭是一个无法准确预测的事情。在上下皆放松警惕的情况下,哪怕是一次突然空袭亦将造成不可想象的惨重牺牲。因此,重庆市政府当时在防空事务上的实质性放松显然有失职之嫌。从重庆战时防空事务的全过程看,即便是关系民众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的抗空袭事务,一般民众也不可能自然成为主导者,政府必然是任何公共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其任何失误、疏忽或失职都有可能把可以降低或避免的损失变为严重损失。这是历史的经验,更是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

#### 参考文献:

- [1] 唐守荣. 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5.
- [2] 防空浅说[N]. 国民公报,1937-08-22.
- [3] 防空须知[N]. 西南日报,1938-07-24.
- [4] 防空部昨邀各界茶话[N]. 国民公报,1937-09-07.
- [5] 明. 敌机不足怕[N]. 万州日报,1938-02-21.
- [6]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65.
- [7] 市府拟增征房租充防空经费[N]. 国民公报,1937-08-08.
- [8] 防护团一四区团昨分区检阅[N]. 国民公报,1937-07-28.
- [9] 防空司令部邀新闻界茶会[N]. 国民公报,1937-09-4.
- [10] 防空部扩大宣传组十大宣传队[N]. 国民公报,1937-10-29.
- [11] 防空演习明日举行[N]. 国民公报,1937-10-22.
- [12] 本市各街赶筑防空壕[N]. 国民公报,1937-11-14.
- [13] 预防空袭谋疏散人口改办公时间[N]. 国民公报,1938-02-09.
- [14] 朱世通. 四川防空之重要[J]. 防空季刊(创刊号),1938-05-01.
- [15] 积极建设防空[N]. 万州日报,1938-01-29.
- [16] 黄镇球. 我国防空建设之动向:第1卷[J]. 防空季刊,1938-09-01(2).
- [17] 后方的宣传民众与组织民众[N]. 国民公报,1938-01-13.
- [18] 训伪. 对第二次防空演习的希望[N]. 国民公报,1938-02-18.
- [19] 去年今日的重庆[N]. 新民报,1938-12-13.
- [20] 宜昌传来空袭警报[N]. 国民公报,1938-01-28.
- [21] 本市严备寇机来袭[N]. 国民公报,1938-02-20.
- [22] 空袭危机迫于眉睫附渝各县加紧防空[N]. 国民公报,1938-02-20.
- [23] 石猷方. 防空的理论与实际(一)[N]. 新民报,1938-03-23.
- [24] 重庆市场冷淡[N]. 万州日报,1938-02-26.
- [25] 内江合川县民畏空袭纷纷下乡[N]. 国民公报,1938-02-26.
- [26] 镇静[N]. 国民公报,1938-03-11.
- [27] 敌人的飞机大炮轰不醒荒唐唐梦[N]. 万州日报,1938-06-28.
- [28] 陈熏. 从空袭说到迷信[N]. 新蜀报,1939-01-21.
- [29] 昨日本市空袭警报[N]. 嘉陵江日报,1939-01-16.
- [30] 天上本无事[N]. 西南日报,1939-01-21.
- [31] 杨吉舜. 我们是不“在劫”的[N]. 万州日报,1938-02-23.
- [32] 肃方. 卑污的屠杀[N]. 国民公报,1939-01-19.
- [33] 短评:市区危险赶快下乡? [N]. 新民报,1939-01-16.
- [34] 刘景弼. 防空疏散的意义:第3卷[J]. 防空月刊,1944-03-31(7、8).
- [35] 野子. 疏散妇孺[N]. 国民公报,1938-06-18.
- [36] 疏散渝市人口办法[N]. 国民公报,1938-10-02.
- [37] 成渝各机关昨会议[N]. 国民公报,1939-02-23.
- [38] 社会局书告民众[N]. 国民公报,1939-03-04.
- [39] 疏散人口实行阶段社会局发起宣传周[N]. 国民公报,1939-03-05.
- [40] 疏散人口初步挨户劝告[N]. 国民公报,1939-03-10.
- [41] 本市疏散人口将组统一性机关[N]. 国民公报,1939-03-11.
- [42] 市民自动疏散轮渡拥挤[N]. 国民公报,1939-01-20.
- [43] 无长. 疏散人口[N]. 国民公报,1938-11-05.
- [44] 敌机袭重庆[N]. 西南日报,1938-10-07.
- [45] 消极防空与民众责任(再续)[N]. 西南日报,1938-12-24.

- [46] 半数未迁出[N]. 西南日报,1938-12-25.
- [47] 时论:论疏散与动员[N]. 万州日报,1938-11-29.
- [48] 社论:疏散人口刻不容缓[N]. 国民公报,1939-03-30.
- [49] 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重庆市防空志[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50] 努力从事救济工作[N]. 申报,1939-05-06.
- [51] 大火昨晨扑灭[N]. 申报,1939-05-07.
- [52] 敌机昨两次大举袭渝[N]. 国民公报,1940-08-20.
- [53] 大批日军袭渝[N]. 申报,1940-08-21.
- [54] 余鸣. 敌机狂炸后的难民:第3卷[J]. 群众,1939-05-08(2).
- [55] 陆诒. 敌机狂炸了重庆:第2卷[J]. 群众,1939-06-11(24,25).
- [56] 日机滥炸渝市[N]. 申报,1939-05-10.
- [57] 蒋委员长手谕[N]. 新蜀报,1940-06-23.
- [58] 敌机昨两度袭渝[N]. 新华日报,1940-08-20.
- [59] 渝防空洞[N]. 新蜀报,1940-07-26.
- [60] 戴溯洄. 火[N]. 国民公报,1940-11-15.
- [61] 行都在洪炉中锻炼[N]. 新蜀报,1940-08-23.
- [62] 格兰姆·贝克. 慢性自杀的腐朽统治——大后方见闻[G]//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十编外国人士作品).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63] 杨光远. 四川省防空协会三十年度工作报告[J],防空月刊(一月号),1942-01-31.
- [64] 时论:加紧疏散人口[N]. 万州日报,1939-05-11.
- [65] 关于疏散空袭服务[N]. 新蜀报,1941-05-11.
- [66] 短评:快快疏散! [N]. 万州日报,1941-08-18.
- [67] 社论:请市民迅速疏散[N]. 国民公报,1940-02-14.
- [68] 社论:迅速疏散! [N]. 国民公报,1940-04-26.
- [69] 避难设备逐渐增强[N]. 新华日报,1941-06-04.
- [70] 贺司令防空节播讲[N]. 新蜀报,1941-11-22.
- [71] 社论:切实执行疏散[N]. 新蜀报,1942-03-01.
- [72] 潘文华. 怎样纪念今年的防空节:第4卷[J]. 防空月刊,1944-11-21(1,2).
- [73] 陶在湄. 疏散是抗战建国的原则:第3卷[J]. 防空月刊,1944-03-31(7,8).
- [74] 李永光. 疏散与生命财产:第3卷[J]. 防空月刊,1944-03-31(7,8).
- [75] 襄江. 漫谈天下事(六)[N]. 国民公报,1942-11-22.
- [76] 社论:疏散与防疫[N]. 国民公报,1943-06-13.
- [77] 疏散宣传周今日起开始宣传[N]. 国民公报,1943-04-14.
- [78] 社论:及时改进防空! [N]. 新蜀报,1941-11-17.

责任编辑 张颖超

## Chongqing People'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Japanese Severe Bomb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 Case Study of Reports from 1938-1943 People's Public Newspaper and others

LU Ke-liang, LIU Qiong-f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Few people in Chong Qing accepted the avoc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hat the passive air defense was the best choice and many more people were waiting and seeing as a result of the blind superstitious beliefs and dependence on sheer luck at beginning of the Japanese sever bombing of Chong Qing, which, though, caused the big alarm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in Chong Qing. There were two sharply different reactions to the wanton and indiscriminate bombing between May, 1939 and September, 1941. One is calmness, and the orderly obedience to the directions. The other is submitting to the will of Heaven and paying no attention to the orders. The common people in Chong Qing seemed to have forgotten the miserable condition as time went by with the decrease of bombing after October, 1941, and they began to get back into the trivial actual life and didn't care much about the public affairs any more.

**Key words:** Chong Qing people; the severe bombing; attitudes; the anti-Japanese war